

中蒙劃界史迹初探(上)

——「同志加兄弟」的博弈

● 劉曉原

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即面臨着同北方鄰國蒙古人民共和國複雜的雙邊關係。本文指出，歷史遺產、意識形態、國際環境、民族關係等錯綜的因素，伴隨着脫胎於清代統屬體制的中蒙關係發展，使之從一種彼此界限不明的新型國家關係架構，經歷由「同志加兄弟」的親密關係到相互猜忌、仇視的變化，終歸落入一般現代國家關係的窠臼，雙方在1962年簽訂邊界條約。在此過程中，對再現歷史記憶的孜孜追求、對國際大同的朦朧嚮往、對冷戰國際陣營利益的有限服膺，以及各自與蘇聯關係的差異，導致中蒙政府對雙邊關係的走向和正常性各有理解。1962年劃定邊界，標誌着中蒙關係在近現代領土屬性轉型的意義上走入正軌。同時，在雙方各自秉持的政治理念裏，這條邊界線體現更多的，卻是相互加深的敵意。

關鍵詞：領土屬性轉型 兄弟國家 中蘇分裂 中蒙邊界 民族關係

編者按：由於篇幅關係，本刊將分兩期刊出文章，本期先刊出第一至五節。

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其面臨的所有邊界問題中，中蒙邊界問題十分特殊。與中蘇、中印、中越等邊界不同，中蒙邊界並沒有發生引人注目的衝突。然而，中蒙邊界問題具有中國同所有其他鄰國的邊界問題所不同的鮮明特點。首先，這是中國在二十世紀方才出現的邊界問題，開始於1945年

* 本文所利用的俄國、蒙古檔案，是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周邊國家研究院沈志華教授領銜的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中國周邊國家對華關係檔案收集及歷史研究」(15@ZH009)第二期子課題「蒙古國中蒙關係檔案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的同仁整理、翻譯的。參與這項工作的有北京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王浩教授、劉迪南副教授和袁琳講師，上海大學歷史系哈日巴拉講師，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李曉亮副教授、金泉和白林講師，華東師範大學周邊國家研究院崔海智副教授、谷繼坤講師、烏仁其木格助理研究員等。康奈爾大學博士研究生王安然為整理本文涉及蒙、俄檔案的註解提供了幫助，特此致謝。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其次，這個問題在1949年以後包含了極其複雜的邊界理念，集國際、黨際、族際（民族／族群）的內涵於一體。最後，1960年代中蘇分裂以後，中蒙邊界成為冷戰時期最具戰略意義的邊疆地區之一，不但蘇聯陳重兵於蒙古，內蒙古自治區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成為中國國內唯一重劃區界的省區。

由於材料匱乏，比之於中蘇、中印、中越等邊界問題，中蒙邊界問題較少受到學界的注意。本文所反映的，只是對中國、蒙古、俄國檔案材料的初步梳理，對一些重要問題的探討只能點到為止，觀點也不成熟。全文的着力點，在於拓寬對中蒙邊界問題的理解，試圖說明中蒙邊界問題的解決，不僅取決於中、蒙、蘇三國政府在冷戰時期的外交決策，更是近現代中國領土屬性轉型和東亞國際關係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 官方研究

儘管學界對中蒙邊界問題研究較少，但是官方在不同時期還是做了詳盡的內部研究。目前可以看到中國方面的研究資料有三種：第一種是1963至1965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參）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組織有關軍區和省區黨委編纂的中蘇、中蒙邊界問題的多卷資料；第二種是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在1989年編輯的資料，其時改革開放已歷十年，冷戰也接近尾聲，但中蘇關係尚未解凍；第三種資料成稿於1993年，編輯者的背景不詳，但從資料的「內部」定位來看，顯然也有官方背景^①。這些資料對於中蒙邊界形成的描述是一致的。

簡言之，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以後，中蒙雙方對於邊界線有不同看法，蒙古主張以當時的蘇製地圖為準，而中國國民黨政府則堅持以中國對內、外蒙古的原行政區劃為準^②。中蒙邊界的最後劃定，完成於1962年10至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舉行的邊界會議，以及12月簽署的《中蒙邊界條約》。當時雙方各自的「建議線」基本一致的邊界約為2,450公里。通過兩次會談，雙方解決了有爭議的三十二個地區的歸屬，共涉及16,329平方公里；劃歸中國的約5,620平方公里，佔爭議地區總面積的三分之一強，劃歸蒙古的10,709平方公里，是爭議地區總面積的三分之二弱。《中蒙邊界條約》簽訂以後，兩國邊界全長為4,672.7153公里，同蒙古臨界的中國省區包括內蒙古自治區、甘肅和新疆，其中內蒙古與蒙古的邊界為3,105.7683公里。這些資料表明，解決爭議的依據是歷史和當地居民的經驗，雙方磋商後各自做出了讓步^③。至於為甚麼中蒙兩國在領土面積上達成如此結果，以及這些得失各具甚麼樣的經濟和地緣戰略意義，在下篇的有關討論裏會有涉及。

在這些正式、詳盡的官方研究已經存在的情況下，是否還有研究中蒙劃界問題的必要？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上述資料的編纂基於從1960到1990年代國內外政治環境幾次急劇變化而衍生的不同政治理念。從今天的眼光來